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 思潮研究（下）

郑大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 (下)

## ——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

郑大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 / 郑大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925 - 1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057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肖 辉 孙婷筠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62.75  
字 数 996 千字  
定 价 228.00 元(上、下)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四章

# 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

自晚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学术救国”思潮，这一思潮认为，学术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加强学术研究，使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九一八”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知识界对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并在反思“五四”以来“整理国故”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和阐释，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建设民族新文化，抵御日本的侵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一 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学术创作是民族复兴之基础，“九一八”后，知识界从哲学、文艺、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学术创造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七七”后，随着“抗战建国”国策的提出，知识界围绕“抗战建国”和“学术建国”的关系各抒己见，阐述了他们的“学术建国”主张。

#### （一）学术创作是民族复兴之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君勱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他在该书的“凡例”中写道：该书的各篇之间虽“鲜联络关系，自愧不如菲希德（即费希特——引者）之《对德意志国民讲演》，然反求诸己之精神与菲氏同”，“其要旨不外乎民族之自救，在以思想为主、文化为

主为基础”，民族之复兴，在以学术创新为前提。<sup>①</sup>譬如，他举例道：大英帝国的发展，以莎士比亚、培根、密而顿为先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为前驱；德意志统一事业的完成，有赖于文学、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歌德、席勒的文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哥丁大学的自然科学，孕育了德意志民族的独立精神，从而为俾斯麦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创造了前提。中国民族复兴大业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成功，其原因之一也就在于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维新派、革命派都自政治上下手以图建设国家，而在学术研究上——合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文艺、哲学和科学上的创作用力不够，政治上用力过多，必然会造成派别林立、内争不断，其结果是全国分崩离析，外敌乘之。如果移一部分全国之心力用于文艺、哲学和科学上的创作，这一定会有裨于民族国家的建立。

张君勱还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艺上、哲学上和科学上之创作，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第一，中国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主张，因而造成学术界思想争论不断，严重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诚欲有以统一之，决非复古二字所能为力”，唯有以本时代的中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样积日稍久，自为人们所公认而奉为圭臬。这是学术创作有裨于民族复兴者一。第二，三四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以派遣留学生为唯一长策，美国若干人，英国若干人，法国若干人，俄国若干人，日本若干人，由于所留学的国家、居住的环境不同，受教的师说、闻见的风俗人情的差异，各挟其不同之印象以归，故中国思想界中隐然有美、英、法、德、俄、日的势力范围存在。诚欲补救，“惟有奖励国人的自主的思想，国族本位之学说”，这样才能合此众多的“以国为别之学说”而冶于一炉之中。这是学术创作有裨于民族复兴者二。第三，科学虽无国界，但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如何，体现的是这个国家的智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今日科学界如果能出现德国的洪蒲尔氏、黎比希氏和印度的拉曼氏那样的科学大家，世界各国也必为之肃然起敬。这是学术创作有裨于民族复兴者三。第四，理智的表现学术，情绪的表现诗

<sup>①</sup> 张君勱：《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凡例》，再生社1935年版，第1页。

文，当民族复兴运动尚未成立之际，尤贵有文学家将此愿望形诸诗歌之中，如意大利之但丁，德国之阿恩脱，就是其例证。近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国际上声名大振，并因此而引起世人对印度独立的同情，这绝非偶然的事情。这是学术创作有裨于民族复兴者四。张君劢指出，上述四端，“合而言之，不外乎民族理智、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之融化”。<sup>①</sup>他并且相信，今后中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那么全国思想就会有所折中，人民情绪就会欣欣向荣，民族复兴、民族建国的大业就一定能完成。故他把合乎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创作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础”。

余荣昌在《复兴民族先要提高学术》一文中强调：“当这国难日深、国际风云最紧急的时候，复兴民族，提高学术，实为救亡图存当务之急。”因为，“（一）学术能提高民族底地位”。学术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而科学是“救国救民族之唯一要素也”。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发达，国家的大小事情，无论怎样纷扰，都可以本着科学的精神、知识、经验及方法，来安内攘外。综观当今世界，凡科学昌明的国家，国家的威力弥漫全球；而科学衰落的国家，其民族或人民则不能自立，最终没有不被别国吞并的。因此，我们要谋国家富强，提高民族地位，就必须提高学术，昌明科学，有了科学的智识，才能巩固我们的国防，才能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从而得到更优美的境地。“（二）学术能改变社会”。一个社会的良窳，与学术发达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教育的落后、学术的萎靡，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丛生。我们学术界同人，如果能负起改良社会的责任，使缺乏学术训练的国民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那末，社会的黑暗也可化为光明，不良的制度也可革新了”。学术在改良社会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改良风俗”“改良水利”“改良农业”这三项工作。“（三）学术能保持中国固有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认识中国固有的文化，只有认识了中国的文化，才能知道“我们所以能够生活，民族可以复兴”；也只有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当外敌入侵我们的国家、毁坏我们的文化、压迫我们的民族的时候，我们也才有可能同仇敌

<sup>①</sup> 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绪言》，再生社1935年版，第8—9页。

汽，一致抵御，“保护我们的文化，维持我们的生活，恢复我们的民族地位”。然而“现在一般的中国人”，却对中国固有的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加强学术研究，向国民灌输学术知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四五千年光荣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别国所没有的文化。所以古埃及亡了，犹太巴比伦亡了，希腊罗马亡了，只有我们中国，至今存在”，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文化的力量”。总之，他指出，既然“学术能挽救危亡，提高民族地位，改进社会利益，保持中国固有文化”，我们今后就应该注意于“学术研究，提高国民之知识，充实个人之技能，增加我们的力量，去复兴民族”。<sup>①</sup>

郑宏述论述了文艺对于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文艺既不是盛世的点缀物，也不是有闲的消遣品，更不是凄凉的葬花之曲，靡靡的亡国之音，相反能以它的“敏锐力”“爆发力”“感动力”“潜热力”“传动力”和“创造力”给予民族以强有力的刺激、强有力的策动，能促进民族的复兴。“新的文艺创造着新的时代，力的文艺复兴起力的民族，伟大的文艺创造着伟大的时代，健全的文艺复兴起健全的民族，潜到时代的核心，站在民族的前面，把握着时代的动向，探索到民族的出路，这是现阶段文艺者的伟大的使命”。具体而言，他认为文艺具有“打倒利己的个人主义”“肃清残余的封建思想”“铲除浅薄的阶级观念”“排除颓废的劣等根性”“阐发过去的光荣史绩”“树立坚强的民族意识”“增进正确的世界认识”等社会功能，而这些都有利于民族的复兴。比如，民族意志消沉的民族，决不会努力图谋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知努力图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当受到外族的侵略或压迫时，即不能努力抵抗，最后结果，必致陷于灭亡。“所以，要复兴民族，树立起坚强的民族意识，遂亦为急迫的要图，而成为文艺的使命之一。”<sup>②</sup>刘麟生认为，文学既有待于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又有待于文学，二者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并从这种辩证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文学如何为民族复兴服务的问题。首先，“复兴时代的文学，应有时代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靡靡之音，也不是凄惨之调，乃是激昂慷慨发扬

① 余荣昌：《复兴民族先要提高学术》，《民钟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

② 郑宏述：《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复兴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2月16日。

蹈厉的气象”，就像法国革命的国歌、英国培根的政治科学论文和美国林肯的演说词一样，能鼓励人们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其次，“复兴时代的文学，应多以复兴时代的生活为背景、为材料”。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复兴时代的生活，便是我们现在文学的思想中心。而无病呻吟的文学是早不合于现代思潮，为人们攻击得体无完肤。所以文学在复兴时代，要以言之有物为先决条件。<sup>①</sup> 郑善林的《复兴民族与文学》一文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我们在这广漠无限的宇宙中，如果没有文学的记载，哪能知道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发生的事情呢？文学的内容包含着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以及将来的希望。人生之所以能够继续地前进、继续地向前努力、继续地绵延不绝，这也有赖于文学给我们的赐予。当我们高吟着《马赛革命歌》时，雄壮的气势，宛如喜马拉雅山峰峦起伏，不知几千里，宛如太平洋狂风巨浪，不知几万里，令人顽廉而懦立；当我们齐唱着岳飞的《满江红》时，未有不热血澎湃于胸腔之中；当我们诵读波特列·亨利的“不自由勿宁死”的演说词和邹容的《革命军·绪论》后，不能不义愤填膺、热血涌沸。这种富有强烈性的刺激，除了文学外，你想还有什么呢？！既然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文学的感染力又这样的伟大，那么在复兴民族的历程中，又怎么能够让它缺位呢？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谁都知道是受了孟德斯鸠、福祿特尔和卢梭诸先生的影响，尤其是卢梭，他大声疾呼着要“返回自然”，这种主义给当时的人们不小刺激，深深地印入法国人的脑筋，化为一粒粒的革命种子，缩短法国革命的爆发期。俄国的大革命，也直接或间接地受了拉台西契夫、都介耶夫、海尔岑、托尔斯泰等大文学家的鼓吹……这些实例，很可以证明文学不能脱离现实，也就是文学在复兴民族的历程中的位置。“照现时代来说，把文学用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把文学当作发表个人的哀愁、描写个人身边琐事的时代也过去了，把文学当作空洞的描写社会、预示未来的光明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所要求的文学，是和复兴民族运动连接起来，负起复兴民族运动所应负的使命，也就是民族复兴运动中一支有威权的生力军。”<sup>②</sup>

① 刘麟生：《复兴时代的文学》，《复兴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9月1日。

② 郑善林：《复兴民族与文学》，《湘湖学生》第1期，1937年1月。

顾毓琇借用诺贝尔奖获得者郎穆尔博士的话，批评中国的科学家为学术而研究学术，没有把研究学术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他强调既然学术研究的成果只有一部分可以被用来为民族复兴服务，那么“我们在国难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就应该有所选择，“从国家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发点，去推求这些问题相关的学术方面”。比如，“我们研究农村组织，而以中国的农村问题为出发点，那么我们虽不妨研究欧美以及印度朝鲜的农村，但是我们注意的目光会引我们着重于某一部分的材料。否则，一个人尽可做一篇十万字的欧美农村概况，而其中选材方面，或者我国所最要参考的几点，反而简略了”。<sup>①</sup>梁贤达指出，“民族强弱与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在欧洲强盛的民族，不但政治组织科学化，经济组织科学化，社会组织科学化，教育组织科学化，甚至于他们人民的精神都科学化，人民的体育都科学化，他们的一切，都是应用科学方法，都是科学化，科学的发达是“欧洲强盛民族之所以强盛”的重要原因。美国建国虽晚，但“百余年已达到富强地位，亦因能其创造科学，发达科学，应用科学之故”。而“反观世界红人黑人及各弱小民族，他们的脑筋缺乏科学训练，他们的社会组织缺乏科学的精神，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科学的应用，一切的一切都是盲动的而非科学的”，所以他们就必然为“科学前进的民族所侵略，侵略之后又不能抵抗”。现在弱小民族，若再不从科学发达下手，力图振作，将来必趋于灭绝之路。历史已经证明，“科学发达的民族必存，科学落后的民族必亡”。我们要复兴民族，就必须使科学发达起来。<sup>②</sup>

马君武将“科学”视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髓，认为国人应该运用西方的“科学”来发展中国文化，以此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他指出：“中国古代学者注重思想而研探的对象，则为伦理道德；希腊方面则所崇尚者为科学与实用，于是东西的文化的进展，渐渐不同。”并且，科学本身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现代科学发达，交通工具发明，而科学于民族间的生死存亡，关系异常密切！盖科学即智识的结晶，为现代文化的骨骼”。尤其是“科学”在方法和智识之外，“尚有一种

① 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② 梁贤达：《科学与民族复兴》，《皖光半月刊》第5期，1934年。

创造前进的精神”。“科学”也成为“现在世界无论任何民族”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如果没有“科学素养，不知利用科学成果，则结局惟有没落与灭亡，我国东北四省之所以为敌侵占，西北旦夕在危殆当中，里面固有极综错的国际关系存在，而人家能利用现代文化精髓——科学，以制造最新的‘生产工具’及‘战斗武器’，而我则墨守旧习不懂科学，不知利用科学，国家民族遂致不能保障其自由与独立”。所以，“吾人亟应努力科学，发展科学，以适应现代生活的方法，庶几可以奋振民族改进社会”。科学还成了“现代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在生产的过程中都是以科学作为标的。<sup>①</sup> 马君武非常重视科学，因为科学对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由此希望能够运用科学这一现代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马君武一样，陈高慵也强调了科学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在《怎样使中国科学化》一文中写道：在今日的世界上，虽然先进国家中也还有一部分人不明了科学的真义，落后国家中怀疑科学的人就更多，但在事实上，科学的权威已经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统制了，自然科学的现象需用科学来说明，社会上的事情需用科学来解释，乃至人类意识中的精神作用亦需用科学来研究，科学不仅成了我们知识上理解一切的工具，而且成为我们生活上实践一切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我们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批判和创造一切思想学术。否则，将为自然力所侵害，为社会制度所压迫，甚至自己的思想意识亦可能成为作茧自缚的工具。“所以就今日的世界看来，民族之文明或野蛮，国家之强盛或衰弱，生产之进步或落后，其根本原因，都在能否接受科学与运用科学之一点。”科学虽然如此重要，然而“从中国文化史上来看，知道中国过去的学术思想上虽有一点科学的遗迹，但是按严切的科学本质来说，则可以说数千年中国人的思想绝没有超脱玄学的范围。”因此，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要想使中国民族与各先进民族在世界并驾齐驱，使中国人民同能享受现代的生活，无疑地第一步工作就是把科学的文明迎头赶上去”。<sup>②</sup>

作为教育工作者，江问渔特别重视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他认

① 马君武：《努力现代文化去复兴中华民族》，《宇宙旬刊》第2卷第2期，1935年。

② 陈高慵：《怎样使中国科学化》，《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

为，民族的生命是文化，而“发扬我们的文化，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都是教育的唯一责任”。为此，他根据民族复兴的需要，就今后的教育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针对国难。”他认为当时的教育，虽说是要有世界性，不是专门教育国人去和外国人打仗，但当此国难当头的时候，好比一个人家，大盗进了门内，刀已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若再教家里人去从容揖让，这既不武，而且也不智，此时只有鼓励起家里人的勇气，一齐拿起刀来，把盗贼驱赶出家门，才算是正当的办法。同样道理，为排除国难，教育界就应负弩前驱，负起万斤的重担，这不独是救国，也是救自己。“能实施救国教育，才可以不至亡国。”“第二、对于国民性，要认识清楚，对于世界的大势，也要认识清楚。”他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法和形态，样样都是好的，或样样都是坏的观点，固然不对，同样那种认为外国人的生活方法和形态，样样都是好的，或样样都是坏的观点，也是不对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教育界都应下一番审核研究的工夫，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加以适当的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看它是否符合民族的利益，符合的，本国的应保存，他国的也应采取。否则，都应排斥。而“保存采取，也是教育家决定的”。“第三、我们要用特别有效的方法，在短时期内，普及全国教育。”他强调，要通过普及教育，达到以下三个目标：一是改良国民的经济状况，使人人都有饭吃；二是养成国民的集团生活习惯；三是要扩大国家民族的意识，养成爱国的精神。尤其是第三点最为重要，我们要把中国的伟大人物、锦绣山河以及被外国人侵略的历史，灌输到国民头脑中去。具体来说，他建议，作为唤起民族意识的材料，我们应该把鸦片是何时又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对中国产生过什么影响？台湾原来是哪个国家的，为什么会被日本强占了去？中山先生的精神是什么、为什么说他伟大？等等这类材料，应编成五十条或一百条，在学校教育机关和社会教育机关里进行讲授，并作为教材，编入各类课本。最后，他呼吁教育界联合起来，“多用一些脑力，好好研究一番，决定一个具体方案，切切实实的做了十年八年，庶几中华民族前途，才有一些希望”。<sup>①</sup> 郭维屏的《复兴民族与小学教育》一文同样强调了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复兴民族

<sup>①</sup> 江问渔：《中国过去的文化与将来的教育》，《复兴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6月1日。

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最根本最紧要的就是教育。古今中外，以教育的力量复兴民族、强盛国家的先例很多，如德国就是通过教育而实现复兴的。目前中国的国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非常时期，一般年纪老大和嗜好太深的人我们对他不能有多大的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大部分寄托在儿童和青年的身上，我们最大希望也在这些儿童和青年。“我们深信要复兴民族，定要振兴教育，而小学教育，尤为复兴民族根基。”因为，“要民族复兴，先要充实民族的力量，发扬民族的精神。要民族有力量有精神，我们只有从小学教育的军事化、生产化、科学化入手”。<sup>①</sup> 李思明和萧赋诚特别重视乡村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他们在《民族复兴中的乡村教育》一文中写道：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农业上面的。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先要振兴农业；我们要振兴农业，就先要复兴农村；而要复兴农村，那就必须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确是复兴民族的基本条件。”<sup>②</sup> 他们并就如何重视和推行乡村教育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在上海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看来，“我们要复兴民族，非有民族的教育不可”。而复兴民族的教育可以分三方面，即：养成国民自存的能力，养成国民自治的能力，养成国民自卫的能力。<sup>③</sup>

华生则强调了历史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一文中指出，历史教育的功用，“就在于教人不要忘记过去，教人要从过去历史的认识，而更奋发上进”。这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教人不要忘其所从来；他方面则教人要继承古人，努力振奋，谋民族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在他看来，近年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力之所以会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心，形成了一种“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心理，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一再失败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力的沉重打击这一原因外，没有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在提高民族自信力方面的作用也是其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的需要有适当的历史教育，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是没有比今日最为近切的了。”而要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作

① 郭维屏：《复兴民族与小学教育》，《西北问题季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36年。

② 李思明、萧赋诚：《民族复兴中的乡村教育》，《遗族校刊》第3卷第4期，1936年。

③ 欧元怀：《复兴民族的教育》，《农村改进》创刊号，1934年。

用，就必须对教材和课程进行改革。比如，今日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课程中对于本国史的轻视，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隔绝，致世界史上没有中国的地位，形成轻重倒置、反客为主的现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所谓历史，实际上都是欧美的历史，举的例证，都是欧美的例证。其结果，学生对欧美的历史文化知道得颇多，谈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反而知之甚少。这不符合历史教育的使命。“历史教育的使命，一方面在使人认识其过去的文化，另一方面则在使人明白本国文化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二者必须同时并进，那才能使人认取其自己所负的责任而对本国及世界文化的创造，知所努力。”故此他要求增加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不仅教材要“力求其中国化”，而且老师上课，“引例举证，苟有本国事实，必须尽先采用”。他最后写道：“我们知道一国的文化进步，由于二种力量，即革新与保守。这二者看似矛盾，实是彼此相成的。倘若只有革新创造，没有保守的力量，那么所谓文化势必如无根之花木，转瞬其枯。反之，若只有保守而无革新，那么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然我们需注意者，革新为少数天才的事，非多数民众所可能，他们只能乐观厥成。为此新文化的保持者，这就需要历史教育，其意义盖在提出一国文化进步的动力，即民族的理想，普及于国民大众，且以传之未来子孙。所以，当此历时数千年的民族理想湮灭不彰之时，我们实有对历史教育加以深切注意的必要，这是中国民族复兴的精神的动力所在。”<sup>①</sup> 1934年10月，河南大学史系史学组主任葛定华、讲座胡石青、文史系主任嵇文甫以及教授杨筠儒、张邃青、刘盼遂、姜亮夫、李雁晴诸先生“鉴于国势日趋危亡，欲谋救亡图存，首在复兴民族精神，而复兴民族精神，则以普及历史知识于民众，为最效力之良方，爰特纠合同志，组织‘中华史学社’”，并以下列两点努力为鹄的：一是历史知识之普及，即求完善之方法，使历史知识普及于全民。二是历史研究之专精，即考究历史之内容，辩证史实，充实史料，以适当之历史知识供奉于社会。<sup>②</sup> 葛定华在为“中华史学社”成立所写的《普及历史知识与民族复兴》的“宣

① 华生：《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10日。

② 《葛定华、胡石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史学社”，以“普及历史知识复兴民族”》，《河南大学校刊》1934年10月15日。

言”中也再三强调：“改造国民心理，振作民族精神，其最有效力之方，当莫如历史知识之传播。”<sup>①</sup>

柳诒徵认为，中国不讲民族复兴，不讲民族主义，只讲大同主义，那就不必讲中国历史，尽可以把中国史书都烧掉，随便效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土耳其就行。但要讲民族复兴，要讲民族主义，那就不能空空洞洞地讲我们的民族如何如何的好，实际上仍是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事情去做，这叫挂羊头卖狗肉，文不对题。所以要讲民族复兴，要讲民族主义，“只有研究中国的历史，是唯一的方法”，要“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sup>②</sup>一位名叫“孟真”的作者（从发表的刊物和文章的内容看，该作者不是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引者注）在文中写道：过去的历史是我们数千年来民族精神的结晶，但现今却很少有人读中国的历史书，无怪乎民族精神日趋低落了。所以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须把过去的一切，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加以整理，即由恢复国人对于本国民族的信仰言，加深国人对于本国历史的认识言，也有非常的必要。我们需要把中国过去的一切，分门别类地加以历史的研究。不过历史的研究是纵的，这只能给予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我们要把握现在，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还有一种横的研究工作，那便是系统地计划地译述西方各种科学的名著。我们现在虽然已有许多译品，但因为是无计划无系统，所以不能有什么良好的效果。且以我国知识水准之低下，无计划无系统的翻译，徒使人起无所适从之感。或者不然，竟产生了一知半解的弊病。<sup>③</sup>

既然合乎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创作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故张君勱以创作合乎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为己任。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他讨论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新哲学的创造，当代政治思想以及黑格尔哲学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就中西比较而言，他认为“以孔孟以来之学术，与西方近代科学相对照，则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知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两文化之

① 葛定华：《普及历史知识与民族复兴——为中华史学会成立宣言》，《河南大学校刊》1934年10月8日。

② 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第5卷第1期，1934年。

③ 孟真：《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0日。

所以判然各别”。<sup>①</sup> 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他反对科学万能论，但也对以前所持的科学与哲学截然二分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主张“科学与哲学之携手”，即“在科学家的立场，用不着排斥哲学家；哲学家当然亦不必排斥科学家，且应引为好友”。<sup>②</sup> 于中国新哲学的创造，他指出，中国哲学不能只停留在翻译介绍西方各派哲学的阶段，“仅以依样画葫芦了事，而应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创造出自己的新哲学。具体来说，他认为，以后中国新哲学应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吸取英、美、德、法等国哲学之长；（2）富于调和性，不走极端；（3）关切伦理、教育、政治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实用问题；（4）注重冥想，承认形而上学。<sup>③</sup> 至于当代政治思想，他以“混沌”对立，并认为中国今后的政治出路，第一，先应顾到国族利益，而将阶级斗争放置于后，第二，应于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得平衡。<sup>④</sup> 他还依“民族活力”的盛衰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所谓“民族活力”，“即民族的生存力”。他认为那种拿秦朝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上古史，此后为中古史的分期法，“把中华民族发展膨胀力之一点完全忽略了”，这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如果以“民族活力”为标准，那么秦汉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一期，历经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而建立起来的隋唐和宋朝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二期，如今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三期。不久他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主要通过对中、印、欧历史文化的比较，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提出未来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应以“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为“总纲领”。<sup>⑤</sup>

历来强调治史不求致用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即提出要加强中国民族史与地理学的研究，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他除了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

① 张君勱：《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再生社 1935 年版，第 6 页。

② 张君勱：《科学与哲学之携手》，《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再生社 1935 年版，第 118 页。

③ 张君勱：《中国新哲学之创造》，《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再生社 1935 年版，第 93—94 页。

④ 张君勱：《当代政治思想之混沌》，《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再生社 1935 年版，第 163—164 页。

⑤ 张君勱：《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21 页。

还与谭其骧、冯家升、史念海等人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了一份《禹贡》半月刊。之所以用《禹贡》为杂志的名称，是因为“禹贡一篇于吾国地理书中居最早，其文罗列九州，于山川、土壤、物产、交通、民族诸端莫不系焉；今之所谓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者，皆于是乎见之。以彼时闭塞之社会而有此广大之认识，其文辞又有此严整之组织，实为吾民族史上不灭之光荣。今日一言‘禹域’，畴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以此自名，言简而意远”。<sup>①</sup>《禹贡》创刊词则表明了他们创办该刊物的目的：“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他们还特别强调研究历史地理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意识，指出：日本用“本部”一名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的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从而为他们的侵略制造历史根据。在此情况下，不研究历史地理，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郡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岂不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sup>②</sup>

## （二）“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

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已经提到，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除《抗战建国纲领》外，这次临全大会还通过了陈立夫等31人提出的《确定文化政策》案。该提案认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同等重要，都是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是建国的准备阶段和必经过程，建国是抗战的终极目标。因此，建国过程中的所提倡的文化，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2）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3）抵御不适合国情的文化侵略。在该提案所附的实施纲领中，关于学术建设的具体规定也有三条：一是切实整理中国历代发明和原有文献，以发扬固有文化；

①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1期，1936年1月1日。

② 《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

二是人文科学之教学，应以中国社会现象为中心；三是在世界上大力弘扬中国固有文化，以促进人类文化之向上，生活之淑善。<sup>①</sup> 这些规定强调了人文科学应关注中国社会现象，整理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并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由于此文化政策，特别关注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故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学术建国的决策。

国民党临全大会闭幕不久（5月），贺麟即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的时事评论。他首先充分肯定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积极意义，他说：“中国多年来内政外交的病根，就在缺乏一个可以集中力量、统一人心、指定趋向、可以实施有效、使全国国民皆可热烈参加工作的国策。而目前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却正式公布了这样的伟大的中心国策。这国策就是‘抗战建国’。抗战建国就是中华民国当今集中力量，统一人心，指定趋向的中心国策或国是……这个国策从远看可以说是积民国成立以来二、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从近看可以说是积卢沟桥事变以来几个月艰苦支持、死中求活、败中求胜的经验与教训而逐渐形成的至当无二的国策。”接着，贺麟对国民党以前所追求的“武力建国”提出了批评，认为“武力建国”实即“内战建国”，而“内战建国”无异于“内战亡国”。正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自淞沪抗战以及喜峰口、南口抗战之后”，国民党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建国”方针，始终“徘徊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之下。但交涉无要领，抵抗无决心，无全盘计划”，其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得寸进尺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在充分肯定《抗战建国纲领》所提出的“抗战建国”之国策的基础上，贺麟提出了自己的“学术建国”的主张。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军备薄弱”的国家，而日本则是“军力雄厚”的“世界第一等强国”。以一个经济落后、“军备薄弱”的国家来抵抗“军力雄厚”的“世界第一等强国”的侵略，并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实现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除了“军事的抗战”和“经济的抗战”之外，还必须进行“精神的抗战”“道德的抗战”和“文化学术的抗战”。如果说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远远落后于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编印，第344页。